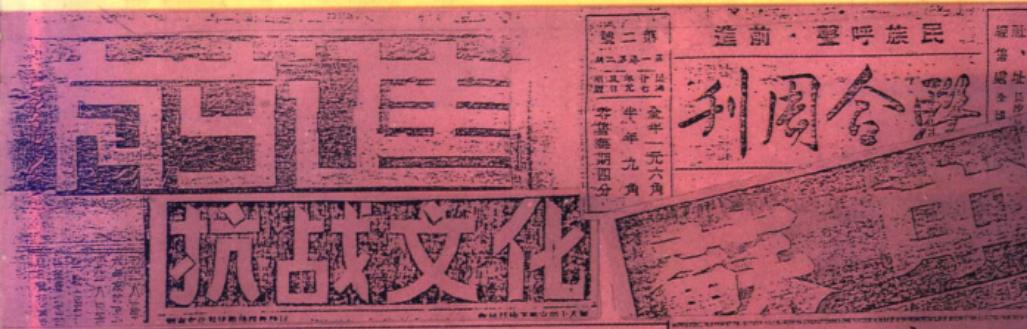


# 長沙文化城

舊古司

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





# 長沙文化抗敵

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史志办编  
湖南省文化厅

顾问 曹国智

主编 黎维新 周德辉

编撰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招明 陈吾南

胡昭鎔 楼 震

萧笃宋

湖南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长沙

[湘]新登字 001 号

长沙文化城  
CHANGSHA WENHUA CHENG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史志办编

湖南省文化厅

黎维新 周德辉 主编

责任编辑 曾祥虎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图书馆出版社印装

199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4 插页：4

字数：577000 印数：1—1500

ISBN7—5438—1003—4  
K·190 定价：25.00 元

徐特立在湖南大学作抗日讲演后留影(岳麓书院门前)



抗战初期的周恩来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最初址——徐家祠堂



張主席發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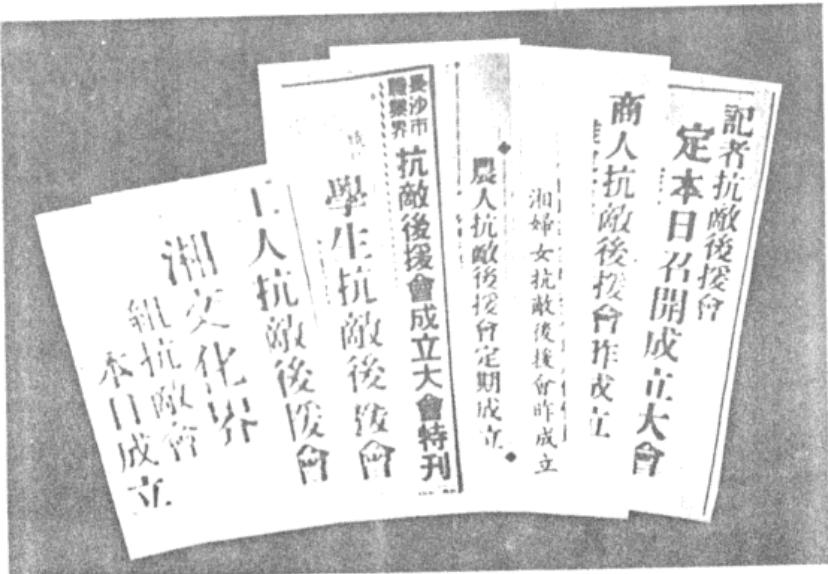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一月八日

二二八三抗日名將軍印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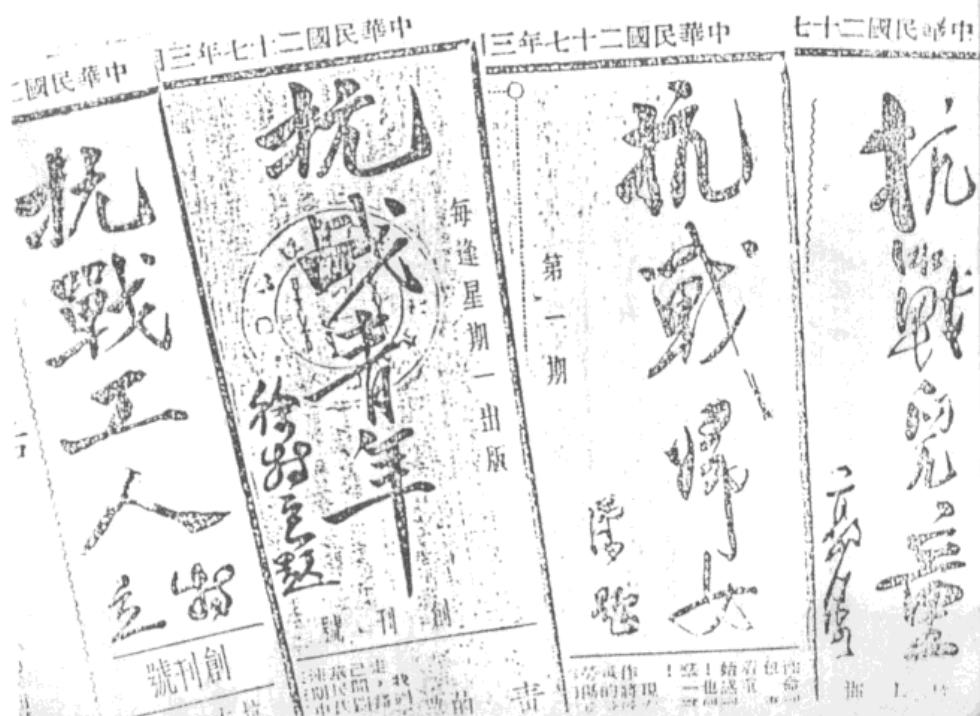


一、軍事上：吾軍士氣低落，軍隊疲憊，軍械彈藥不足，軍事指揮失當，軍事行動遲緩，軍事作戰能力下降。二、政治上：政府威信喪失，內部分裂，外有列強干涉，內政不穩，經濟蕭條，社會動盪，民心離散。三、社會文化上：思想保守，教育落後，科技水平不高，文化知識匱乏，民族意識薄弱，對外開放程度低，國際地位下降。



省会长沙抗日群众团体纷纷建立

徐特立、郭沫若、田汉为《抗战日报》副刊题字



抗战初期省会长沙的部分报纸

湖南國民日報

沙斯

觀察日報

號四五一號

王二月

敵在赤湖東岸受挫後

又有沿江西犯頭金關

國軍全入我敵犯頭在洞口西大關

抗戰日報創刊

抗戰到底  
張作中

抗戰日報

敵國內險象環生

許大使紙面談話

軍人思想及民力統制問題

敵

抗戰到底  
張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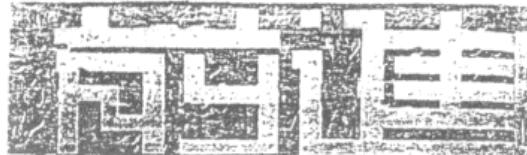
創刊之詞

必勝利後方

我於局

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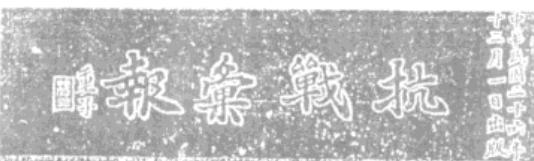
抗戰到底  
張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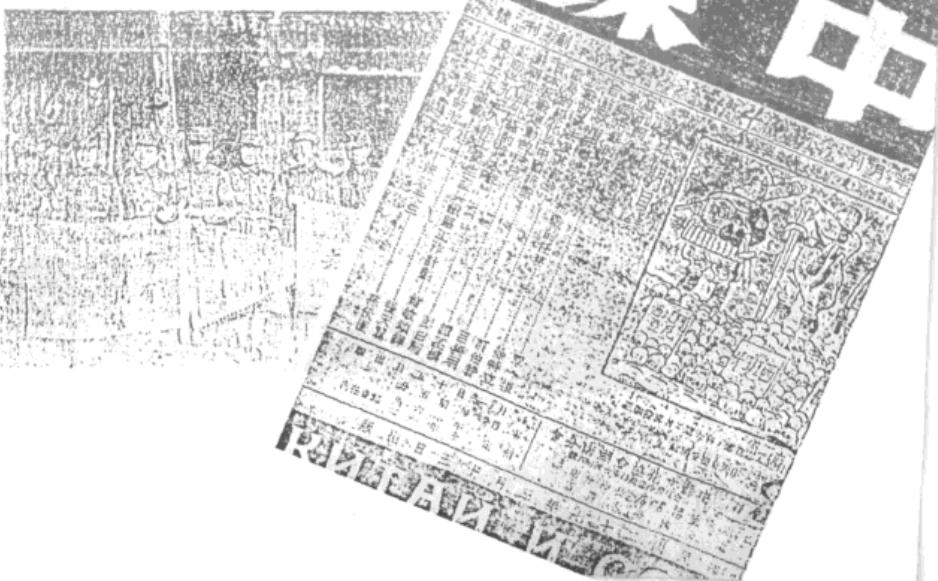
抗战初期省会长沙的部分期刊



# 新湖南



民國二十二年元月一日創刊





徐特立在长沙的部分言论和文章



抗战初期在长沙出版的部分图书



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等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中排左一)、池田幸子(前排左一)1938年10月在长沙陶园

演剧队在长沙街头演出





豐子愷作



抗战初期在长沙报刊上发表的部分美术作品

爹它要去了抗陽  
兒子接上去

敵人的外表和內容



群众在长沙街头观看抗战壁报

## 前　　言

抗日战争(1937—1945)是中国各族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历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在这一伟业中，抗战文化所起的宣传动员群众的作用是很大的，抗战文化自身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尽管在日寇疯狂的侵略下，中国暂时失去了原有的北平、上海、南京等文化中心城市，但同时在延安、武汉、重庆先后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并出现了桂林、长沙等文化城和一些重要文化据点。由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等原因，这些文化中心、文化城和文化据点，无论时间久暂，都各有其特色，各有其贡献。仅就长沙而言，抗战初期就是文化中心转移的一个重要站口，一块重要阵地。1940年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任作民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当时除武汉之外，长沙被称为文化城。”

抗战初期长沙之所以成为文化城，是有其主客观条件的，是当时抗战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长沙本是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文化史和近现代革命斗争史。众所周知，湖南是中国近现代爱国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十分活跃的地区，而这些活动大都是以省会长沙为中心进行的。早在戊戌变

法时期，长沙就先后出现了《湘学报》、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报》等，有力地宣传了变法维新思想。辛亥革命时，武昌首义，湖南是最先响应的省份。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对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全国性影响。……“马日事变”后，湖南的统治当局虽然反共复古，提倡读经，箝制舆论，但仍无法禁绝人民求民主、求进步、求民族解放的声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的“西安事变”，都在长沙引起了反响。尤其是“一二九”运动之后，长沙出现了《湘流》等进步刊物，一九三六剧社等进步团体，进行了抗日救亡宣传。《全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由此可见，长沙人民蕴藏的革命传统的能量是很大的。1937年7月爆发的全面抗战，更把长沙人民心中的抗日怒火点燃了。

在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以张治中为主席的国民党省政府团结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实现。当时的情况是：1937年年底，受中共中央委派，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身份，王凌波以上校主任的身份，回到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老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战士、湖南的老教育家，在湖南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多次公开讲演，使人民群众在十年内战之后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感到无比振奋。他的一些学生和军政界、文化界人士也因对徐老的敬重而开始以新的眼光来观察抗战中的各种问题。紧接着，高文华等也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长沙，奉命将中共湖南特委改为中共湖南省工委（后为湖南省委），由高文华任书记，进一步加强了对湖南党组织的领导。这样就大大推进了中共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群众的发动工作。另一方面，因“一二八”和“八一三”抗战而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在主持湘政之后，

采取了联共抗日的开明态度。他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予以支持；对释放政治犯予以合作；对抗日民众团体和抗日言论也都相当开放；同时实行组训民众、改进政治等措施，并欢迎舆论的监督，说：“绝不怕人民说话，而怕人民不说话。”这就为湖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尽管当时国民党内还有少数人固守原来的立场，摩擦事件仍有发生，但从全局看，湖南是当时国共合作富有成效的省区之一。

湖南和省会长沙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重要的。在滇、黔、粤、桂、湘、鄂、川七省的公路、航路、铁路中，湖南正是中心枢纽，能“绾毂南北，控制东西”。湖南还有丰富的物产，勤劳勇敢的人民。因此，抗战初期湖南成了战略后方，长沙更为人们所瞩目。一些文化教育机关纷纷迁长。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北平民国学院、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和一些文化出版单位，也迁来长沙或在长沙建立了分支机构。许多文化人也仆仆于武汉、长沙、广州之间。这就为长沙增添了抗日救亡的实力与热烈的文化气氛。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长沙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出现了新的面貌。

就文化队伍来说，长沙成了文人荟萃之地。一是随着文化教育机关内迁或因工作来长沙的著名文化人，有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洪深、曹禺、余上沅、范长江、陆诒、张曙、熊佛西、董每戡、薛暮桥、钱君匋等。他们的到来，在长沙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些人虽然停留的时间不长，但通过讲演、写文章或其他方式，对长沙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二是湘籍著名文化人吕振羽、翦伯赞、田汉、张天翼、杨东莼、谭丕模、廖沫沙、蒋牧良、陈润泉等先后从外地回到了长沙；一批原来在大学里就已崭露头角的湘籍大学生萧敏颂、杨隆誉（杨赓）、曹国枢、黄绍湘、曹国智、陈泽云（于刚）、黎树苍（黎澍）、杨润湘、杨第甫、李锐、魏泽同等分别从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回到了长沙，有些人在“七

“七事变”一开始就满怀抗战热情回来了。他们因人熟地熟，或办报纸，或办刊物，或在抗日群众团体和学校里任职，所起的作用更大。还有原来就在长沙的文教界人士李仲融、杨荣国、孙伟、朱之倬、唐揆斋、戴望峰、姜运开等，他们和群众已有联系，同上述来湘的文化人相汇合，形成了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骨干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文化队伍，共同肩负起了开展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重任。

就群众团体来说，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其他各界抗敌后援会以及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等，纷纷在长沙组建，它们成了团结各界上层人士和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是由中共党员、进步人士、爱国人士发起的联系文化界最广泛、最具影响的群众团体。成立以后，不仅联络各界开展了捐钱捐物、慰问伤员、救济难民等项工作，而且有计划地举办了读书、讲演、歌咏、戏剧演出等项活动；创办了会刊《抗战文化》；开办了各类战时培训班，先后培训 800 余名学员，分别回到本县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这种既立足省会又辐射全省的文化团体，在当时大后方的省市中也是少见的。另外，一些原有的社会文化团体和宗教团体，也纷纷为抗战出力。其中突出的是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它不仅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而且到伤兵医院慰劳伤兵，到收容所救济难民，到敌机轰炸的现场抢救受难同胞，还多次主办音乐会、讲演会和戏剧演出等活动，为抗战做了不少实事。

就文化宣传动员的广泛性和作用来说，以文化界为主体的各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向群众进行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大宣传、大发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当时新闻出版成了舆论的先导。由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创办的《前进》、《民族呼声》、《火线下》、《大众报》、《抗战日报》、《观察日报》和《抗战文化》、《中苏》半月刊等，都旗帜鲜明地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原有的《大公报》、《力报》、《国民日报》等，也都发挥了宣传抗战

的作用。图书方面出版了《抗战小丛书》、《农民抗战小丛书》、《中苏小丛书》等多种,发行也很广泛。抗日救亡的剧运更是蓬勃兴起。各个剧团,各个戏剧园、院,各个学校,都纷纷上演新编的救亡剧和整理改编的传统剧,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歌咏也成了抗日救亡的号角。各种游行歌咏、街头歌咏、电台播唱以及大中型合唱、联唱,都深入人心。抗日的街头诗,街头宣传画、漫画,街头壁报,街头讲演和街头展览,更是遍及城镇。

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形成高潮之后,抗战文化的深入也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郭沫若、茅盾等当时在长沙的讲演和所写的文章中,都提出文化人要到救亡工作薄弱的民间去,到前线去。一些作家积极响应,有的去了前线,有的整装待发。一些剧团率先去乡间作巡回演出。《力报》还派出记者上前线、去湘西深入进行采访。与此同时,文学艺术创作质量和歌咏、戏剧表演质量的亟需提高,也成为大家的共识。作家们正在鞭策自己克服浮躁情绪,写出具有时代特点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吴祖光的《凤凰城》就是在那时创作的,成了流传下来的名篇。音乐家张曙、戏剧家曹禺等这时分别到音乐、戏剧训练班作辅导工作。国立戏剧学校还在业余戏剧团队中作“示范演出”。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也力求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作贡献。爱国学人冯友兰、金岳霖教授的学术著作《新理学》、《论道》,就是在长沙“临时大学”形成的。金岳霖还把他的著作命题为《论道》,用意在于使它有“中国味”。他说:“哪怕有一点中国味,也是有利于抗战的。”这两部著作至今仍为研究中国抗战文化史的人们所关注。遗憾的是,因为长沙大火和政局的恶化,长沙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过早地中断,没有深入发展下去。

这段时期,长沙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还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关切和支持。世界学联代表团、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世界妇女代表何登夫人,以及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法国记者李蒙夫妇、日本反